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廖仲凯与何香凝



一、天缘巧合结良缘

近代的广东是中国的前哨，得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的革命志士。廖仲恺与何香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对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志士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1877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一个华侨家庭之中，在家中四兄妹中行二。而比廖仲恺小1岁多的何香凝则于1878年6月27日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商之家，是其家的第九个孩子，原名谏，又名瑞谏。虽然同是广东人，且都拥有可以算作“上流”的社会家庭背景，但廖仲恺与何香凝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

廖仲恺是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排华浪潮中度过童少年时代的。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的备受凌辱与美国白人的肆无忌惮的种族歧视和排华行径，在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父亲廖竹宾是一位对祖国有着拳拳赤子之心的爱国华侨。他常常教导自己的子女说：“祖国是每个人的灵魂和生命所寄托的，灵魂没有寄托的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就像树叶离开树枝一样，失去了营养的供给，便会焦枯而死的。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就像爱护自己

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能够不忘记祖国，不忘记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护祖国的第一个条件。”（程途《廖仲恺》）在父辈的熏陶和教育下，廖仲恺自小就有着强烈的报国之心。

何香凝的少年经历却与廖仲恺有着强烈的反差。何家交游甚广，是一个纵情逸乐豪商富贾之家。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何香凝却与之格格不入，与兄弟姐妹耽于逸乐截然不同的是：何香凝自小就有着强烈的读书求知的欲望。在当时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风气之下，几乎是全凭着坚韧的毅力，从自学开始自己的求学之路的。她不分白天黑夜的念和画，不懂的请教哥哥，甚至于让女仆拿到私塾先生处去请教。这样努力的结果，自然使得何香凝的文化素质和修养远远超过同样背景成长的大家闺秀，为她将来接受新思想和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1893年，16岁的廖仲恺失去了父亲，家境顿时一落千丈，迫使廖家告别旧金山，回广东依托于叔父廖志岗。在叔父的支持下，廖仲恺在家乡和香港开始了求学的生涯。尤其是1896年，19岁的廖仲恺赴香港皇仁书院专攻西学，使他受到了较为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教育和训练。尤其是1897年的年底，他与何香凝结为夫妻，开始了新的生活。

说起两人的婚姻，确实是有一点缘由天定的味道。

廖仲恺的父亲临终时，对于他的婚姻大事留下了将来讨个大脚小姐作媳妇，并且必须照办的遗嘱。原来，根据客家人的规矩，必须讨大脚妇女作儿媳，而且，廖竹宾根据自己漂泊海外的经验得出了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的结论，因此给儿子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廖仲恺的叔父志岗碍于兄长的遗训，自然照办，而且廖仲恺本人也受维新志士关于改革社会风气，“不得娶缠足女子”宣传的影响，明确宣布一定要找一位大脚的妻子。但是廖家是一有身分的仕宦人家，在门当户对的社会风气之下，自然不能找诸如村姑之类身分低卑的大脚女子；但在当时中国，有身分的千金几乎都是缠足的，尤其是在香港，大脚女子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而这时恰恰何家的九小姐——何香凝就是独一无二的大脚小姐。

何香凝的那双大脚完全是她自己顽强抗争换来的。她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将来进入上流社会，执意给何香凝缠足，甚至采用强制的手段。但何香凝自幼憧憬那些驰骋疆场的太平天国的女兵，立志绝不缠足。因此，父母缠一次，她就设法剪开一次。如此经过了几十个回合的斗争，她的父母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由她去了。

1897年1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举行了婚礼，结为了一对美满的夫妻，由此开始了志同道合的新生活。

二、东瀛留学显头角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当时所有有志人士最为关心的问题。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只有学习外国，尤其是向明治维新之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邻邦日本学习。因此，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廖仲恺也非常想去日本，但苦于没有经费，而不能成行。

一天，廖仲恺沉痛地对何香凝说：“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结交革命英豪，共图大业。只是留学的经费一点着落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哪！”

何香凝听罢，接口说：“我可以变卖首饰及陪嫁的东西来筹措经费。”她的家人认为变卖陪嫁物有失体面，极力表示反对。但何香凝执意不听，变卖了陪嫁的首饰及部分家私，连同自己的一些私房钱，最终凑足了两人的留学经费。1902年末及次年初，廖仲恺与何香凝先后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的生涯。

初到日本，两人面临着是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立宪”派，还是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派的抉择。虽然当时“保皇立宪”派占上风，是多数派，但廖仲恺与何香凝没有随大流，而是慎重地考虑，没有当即表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积极投身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浪潮中去。

1903年7月，孙中山来到了日本横滨，第二个月就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成立了青山军事学校。在学校入学的誓词中，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了含有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内容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革命纲领。在9月的一次中国留学生聚会时，廖仲恺与何香凝在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虽然只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但却深深地吸引了廖仲恺与何香凝。

数天以后，廖仲恺与何香凝在黎仲实的陪同之下，专程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来拜访孙中山。孙中山与这三位年轻人畅谈革命的道理，从鸦片战争谈到了太平天国，又谈到了戊戌变法、义和团，着重阐述了只有打倒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才能谋求中国的新生。孙中山的一席话，为这对年轻的夫妇指明了方向，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投身到民主革命的决心。此后，廖仲恺与何香凝又多

次地去拜访孙中山，聆听教诲，从此，廖仲恺与何香凝完全确立了终生追随孙中山、进行民族革命的志向。在孙中山的指示下，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留学生当中积极进行串联活动，结交和物色了一批留学生中的有志之士，为后来同盟会的创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05年7月，孙中山为了将分散的革命力量聚集起来，从欧洲回到了日本，集中了全部的留学精英，准备以兴中会、华中和光复会的成员为骨干，筹备成立同盟会。月底，召开了同盟会的筹备大会，准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但是，这样一个大的举动引起了日本军警界的高度警觉，日本军警百般刁难和阻挠大会的召开。

为了保证成立同盟会工作的顺利进行，孙中山准备找一个不用雇佣日本女佣的较为安全的地方，而当时最为合适的就是自己拥有日本出租屋的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的寓所。为此，孙中山派黎仲实前去与廖仲恺及何香凝商量。

当黎仲实来到廖家时，正值廖仲恺回香港接长女来日本，家中只有何香凝。何香凝听黎仲实说明了来意，不禁犯了难。自己从小当小姐，根本未下过伙房，不雇女佣可怎么办？而且当时东京没有自来水，如果搬了

新家，丈夫又不在家，用水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考虑再三，她坦率地对黎仲实说：“为了革命，做出一点牺牲是应该的。不会做饭，我可以马上偷着跟女仆学习，这不算什么！只是仲恺一时回不来，不雇工人，我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到外面的井里去弄水！”黎仲实听到这种情况，一口将挑水的事情应承了下来。何香凝一听自己最为难的问题解决了，立刻说：“我一定马上着手找合适的房子，找好了就搬！”

第二天，也就是1905年8月7日孙中山与黎仲实来到了廖家，介绍何香凝加入了同盟会。何香凝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孙中山亲切地称她为“御婆样”。“御婆样”是日语女管家的意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何香凝在留学生最多的地区——神田区找到了一所出租屋。虽然这个出租屋租金比原来的贵了一倍多，但何香凝考虑的是面积大，是一上下两层的套房，有七间房子，十分便于同盟会活动，就毫不犹豫地租了下来。在黎仲实的帮助下，何香凝辞去了女仆，搬到了新寓所。后来，这个新寓所也就成了孙中山召集同志开会和同盟会的通讯联络机关。以后，廖家多次搬迁，但都是同盟会的秘密的聚会场所和联络机关。

在留学日本的数年期间，何香凝默默地承担着孙中山交给她的一切工作，不怕麻烦与辛苦，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哪怕是极琐碎的小事，她也都乐于去做。而且，廖仲恺与何香凝还尽力在经济方面资助孙中山和经常招待同志们的饮食。

廖仲恺从何香凝的信中得知了同盟会成立的消息之后，立刻心急如焚地往回赶。9月29日，廖仲恺回到了东京。当天傍晚就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对他讲解了中国革命之必要与三民主义的主要宗旨，以及革命党的性质、作用、党员的义务和牺牲奉献精神等。经何香凝与黎仲实介绍，廖仲恺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由于思想的沟通，廖仲恺受到了孙中山的特别信任，凡是孙中山看到的新书，一般都拿给廖仲恺看。而廖仲恺也经常和孙中山一起研讨看书的心得和体会，互相印证，往往十分地默契。在同盟会中，廖仲恺是真正服膺“平均地权”纲领，深刻理解三民主义并尽力去宣传和求其实现的中坚分子之一。他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先后发表了9篇译作和论文，比较系统地宣传三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积极宣传民生主义纲领的同时，廖仲恺还积极介绍了欧美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各派的学说，他还是我国最早接触和介绍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之一。对于这些新学说的接触和初步的研究，促使他不断从多方面和多角度去思考和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这也为他后来和社会主义力量真诚地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廖仲恺与何香凝加入了同盟会之后，参加的第一次大的政治斗争就是反对日本政府勾结满清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的斗争。

1905年11月，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大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规则》。《规则》中共有15条，主要是对于留学生的种种刁难和限制，诸如不得自由择居，勒令退学者不得复又入学等等，尤其是留学生的各种活动都要征得清政府公使馆的同意，更明显是针对留学生中的革命志士的。

布告一出，立刻舆论大哗，激起了留学生的强烈的反对。自12月始，各地留学生纷纷集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政治斗争。

廖仲恺与何香凝积极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去，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大多数留学生中间，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

不久，留学生内部出现分裂，一派以宋教仁为首，主张坚持罢课和集合全体留日学生集体回国；另一派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张妥协不罢

课。这时，留学生接到了孙中山从越南拍来的电报，不赞成留学生全体回国。廖仲恺与何香凝积极贯彻孙中山的指示，说服那些激进派头脑冷静下来；更反对汪、胡制造分裂和掉转矛头攻击自己的同志的错误做法，团结了大多数，使得许多青年学生通过这次政治斗争了解和靠近了同盟会，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通过这次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同盟会的力量，反而使之更加壮大。

同盟会成立之后，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廖仲恺与何香凝也积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来。不仅积极筹划，而且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训练培养军事人才、筹措起义所需的经费等工作中。尤其是后者，廖仲恺与何香凝利用海外华侨中亲戚和朋友众多的有利条件，尽力为起义筹措经费。孙中山对此非常满意，并且将筹措革命活动所需经费的事宜直接交给廖仲恺与何香凝去办理。

在同盟会组织的西南边境的数次起义中，廖仲恺没有亲身参加，这是因为这段时间廖仲恺接受了孙中山的指派，只身深入虎穴，到天津去从事革命联络工作。

事情的前因是这样的：1905年10月，孙中山在吴淞口接见了法国驻天津的驻屯军参谋长布加卑少校，布加卑传达了法国政

府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意。孙中山就此向布加卑提出了请其派员协助调查国内革命实力的要求。在达成了协议之后，孙中山准备派一得力之人长驻法军营中，以图在北方发展革命势力。经过酝酿，最后选定了廖仲恺，随即写信通知他。

正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廖仲恺接到了孙中山的信之后，立刻给孙中山回信，表示接受这一特殊的使命。

当时的天津，可称得上是虎穴龙潭，因为那里正是清政府京畿重地。廖仲恺接受这个使命，只身潜入到这个地区去建立机关，没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无畏的精神是难以办到的。

与丈夫依依惜别时，何香凝写下了一首诗：

国仇未报心难死，
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
留得支那史上名。

1906年夏，廖仲恺回到了日本，继续完成学业，在日本中央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经济学。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位革命的理财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年之后，廖仲恺完成学业。由于何香凝仍在东乡美术学校高等学科学习绘画，因此廖仲恺只身返回到香港。他没有选择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而是通过各种途

径进入到清朝政府衙门，用合法的职业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联络及内部策反的活动。他考取了清廷的法政科举人，并受派前往吉林省巡抚陈昭常幕下当译员。

在东北工作的1年多时间里，廖仲恺积极协助吉林边务督办、革命党人吴禄贞，与日本当局交涉所谓“间岛问题”，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日本不得不退还了两年前强占的“间岛”地区，其中，作为译员的廖仲恺也有一份不可磨灭的功绩。

廖仲恺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开展秘密的策反等地下工作。在此过程中，他更是尽力掩护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志士。

三、广东共和奠基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新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政权土崩瓦解。两湖和山西、陕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正在吉林的廖仲恺鉴于吉林反革命势力较为强大，只好只身南下，赶回广东参加如火如荼的革命。

在廖仲恺抵达广东以后不久，鉴于他专攻经济，因此任命他为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财政司（部）副、正司长等职，由此开始了廖仲恺一生为革命理财和从事革命活

动的生涯。

在广东独立的最初的4个月内，廖仲恺一直做财政司司长李煜堂的助手，为副司长，他全面协助李司长致力于恢复广东财政，使之走向正轨。

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而言，财政是至关重要的。而当时的广东革命政权，财政方面的问题尤其困窘，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府库空空如洗；二是财政收入来源匮乏，收入锐减；三是百废待兴，财政支出极为浩大。为解决这种窘困，廖仲恺积极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筹措革命政权所急需的军政费用的款项，来解除财政上困窘的局面。

廖仲恺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这三个方面：一是劝募各层民众和海外侨胞捐款助军；二是成立了筹饷局，发行债券借款；三是大量启用和发行纸币，使之流通于市面之上。

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对头，保证了军政两方面的款项支出，很快稳定了广东的政局。

1912年5月24日，年仅35岁的廖仲恺出任了财政司长。他克尽职守，廉洁奉公。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职员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供职财政司10余年，所见长官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尤

其令人信服的是廖仲恺用人唯才，绝无徇私废公的举动，深受时人的敬服。

廖仲恺担任财政司司长不久，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开始推行“地价税契法案”。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这实际上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平均地权”的单税社会主义纲领的具体的实施方案。

在当时全国独立的各个省中，广东是唯一提出了实施同盟会“平均地权”具体法案的省份。廖仲恺想通过这个抽地价税的法案，在改善广东财政收入的同时，将广东建成全国实施同盟会纲领的模范省。在孙中山和广东都督府的支持下，廖仲恺为争取这个法案的通过与实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决的斗争。

1912年6~7月间，廖仲恺几次出席广东临时省议会，解答议员对于“地价税契法案”提出的各种问题。虽然，廖仲恺的工作做得十分地细致认真，但由于省议会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绅商和旧官僚分子，这个“地价税契法案”触及了这些议员自身利益，因而遭到了许多的非难和阻挠。其中，争论最大的主要是税率和地价以什么为准的问题。到了7月底，“地价税契法案”在省议会勉强通过，但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尤其是重新核定地价的条款给取消了。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议员对于“平均地权”实在是缺乏积极

性，这无形中为“地价税契法案”的实际推行增添了不少的阻力。

廖仲恺全然不顾这些阻力，大力推行修正过的“地价税契法案”。在推行过程当中，鉴于离城较远的乡镇换契不方便，又制定了“乡村换契简便办法六条”，并从严追究营私舞弊者。

现在看来，廖仲恺所推行的“地价税契法案”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广东政府财政困窘的境况，筹集大量的现款，以解济当时军政开支的燃眉之急；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为了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伟大的纲领，议定比较合理的征税制度，以求消除社会上的不合理的贫富不均的社会弊病。可以说，在当时的人中，廖仲恺是少数的几个真正极力推行孙中山纲领的人之一，而且是实施“平均地权”纲领的第一人。

比较切实地讲，“地价税契法案”即使真正地实施，也并不能解决贫富不均这个社会弊病；但这个法案若能真正地执行，却可以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消灭封建剥削。这也就是这个法案在广东这个当时最为先进的省份推行，也困难重重的症结所在。广东尚且如此，全国更不用说了。

到了后来，“地价税契法案”的推行困难重重，不久，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

上海车站被暗杀，“地价税契法案”也由此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而国事的变化更是难如人意，最后，“地价税契法案”的推行被迫中止了。

在廖仲恺担任广东财政司司长的这段时间内，他还以很大的精力整顿财政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民主革命政权。

在廖仲恺最初上任的时候，广东财政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1913年度出现了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困窘局面。在如此困境下，廖仲恺竭尽全力，终于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到了8月的时候，省库中已经存有现洋700余万，纸币数百万，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财政当局从未见过，甚至可以说是未敢想过的事情。

在辛亥革命趋于失败的最为困难的逆境中才接手广东财政的廖仲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露头角，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令周围的同志们都惊叹不已。

可以说，廖仲恺在广东民主革命政府理财期间，既是廖仲恺职业革命生涯的初始阶段，也是他为新生的革命政权奠定基石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阶段。

四、讨袁护法卫共和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窃取的头一年，还维持着共和的假面具，孙中山还满怀信心地准备率领同志以在野党的身分发展教育和振兴实业，廖仲恺更是积极追随其后，准备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去，将中国建成一个超过列强的富强国家。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联合其它组织，成立了国民党，以图组织责任内阁，实行民主政治。虽然是由孙中山任理事长，但实际的党务是宋教仁代理。袁世凯逐渐撕去了假面具，1913年3月，指使凶徒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孙中山敏锐地察觉到了袁世凯的野心，主张发起讨袁运动，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往来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之间，秘密从事反袁活动，尤其是力图争取当时的议员反对袁世凯。后来他的秘密活动被袁世凯的密探侦悉，他的名字被列上了被搜捕的黑名单。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廖仲恺得到友人的通报，方得以脱险。

6月间，袁世凯下令免去了江西都督李烈均、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使得国民党掌握的几个省的军政大权全部被剥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这几个省纷纷宣布了独立，由此掀起了捍卫“共和”

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由于各省的行动步调不一致，各自为战，被袁世凯各个击破，很快就走向了失败。广东革命政府瓦解，廖仲恺与何香凝也被迫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国民党内的人心涣散，决心取消旧的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1914年5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为了解决当时人心涣散，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的状况，廖仲恺积极参与中华革命党创办的理论刊物《民国》的编辑工作，并以“微尘”的笔名，连续发表了英国学者何思敬《大私归士》和阿斯吐哥士奇《社会威力为政治生活之本》等两篇译文，号召国人抵制帝制和重建民主共和。

何香凝则将其主要的精力扑到了在留学生中进行联络和宣传工作之上，经常发表演讲和参加群众集会。

中华革命党在组建之初，财政上十分的困难，廖仲恺也就理所当然地挑起了这副理财重担。虽然当时的中华革命党财政部的部长为张静江，但他远在巴黎，因重病之故，不能离法赴日供职。因此，实际上当时财政部的一切事务都是廖仲恺用张静江的印章代行职权。在此期间，廖仲恺竭尽一切力量

筹集款项，从财力方面支持中华革命军的讨袁斗争。1915年，中华革命军组织了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四个司令部，廖仲恺协助孙中山联络各军，并且积极从东京向内地发送讨袁军购置的军火弹药等战备物资。为讨袁军取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以后，被迫宣布取消“承认帝制案”，其“洪宪”帝制的美梦破产了。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梦覆灭之后，廖仲恺与何香凝又追随孙中山投入了规复《临时约法》、重建真正民国的护法斗争。

袁世凯死后，新大总统黎元洪于6月29日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并任命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自此北京中央政权实际上是控制在段祺瑞的手中，段实际上“以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大耍两面派的卑劣手段。

在段祺瑞上台一年以后，孙中山才真正看清了段祺瑞的真面目，认识到不打倒段祺瑞，就不能缔造真正的共和民国。因此，从1917年5月开始，孙中山又投入到了捍卫《临时约法》和共和制的护法斗争。

在这次护法斗争中，孙中山主要依靠的是海军的力量。在争取海军参加护法、归附孙中山并南下护法的过程中，廖仲恺与何香

凝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的工作。廖仲恺积极动员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南下护法；而何香凝则积极做海军家属的工作。

南下护法首先遇到的也是经费的问题。奉孙中山的指令，廖仲恺又担起了中华革命党理财以护法的重任，积极筹措海军总长程璧光率7只炮舰南下和123名议员南下广州所需的巨额费用。其中，孙中山南下启程时所需的巨款就是廖仲恺与孙中山一起同德国驻沪领事及犹太富商哈同磋商筹借的。这次所借的139万多元救急钱就是以孙中山个人的名义，经廖仲恺之手办理的。而当孙中山等一行启程之后，廖仲恺与何香凝仍留住上海，主要工作就是筹款和联络中继站，以后几批启程人员所需的经费都是由廖仲恺筹措支付的。

在广东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后，廖仲恺与何香凝离开了上海，来到广州，廖仲恺就任军政府财政次长。因财政总长唐绍仪未到任，实际上是廖仲恺独力承担着整个护法军政府的经费筹措工作。

广东军政府成立之后，其财政状况十分窘困，经费的筹措十分的困难。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桂系军阀的掣肘。当时窃据广东督军的是桂系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他们把持了广东地方财政税收，不让军政府染指，使得军政府财政来源几乎断绝。

当军政府与沙面领事馆交涉，将上缴北京的“盐余”税款拨交广州军政府之后，陈、莫等又百般刁难阻挠，提出了许多的限制条件。即使前往提款，也由于军政府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而困难重重。其中颇多奇曲波折，常常将廖仲恺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在税收毫无着落的情况下，廖仲恺只有想方设法多方去筹措，真可称得上是呕心沥血，而其成绩卓著。诸如设立筹饷公债局，以发行各种公债票券来筹集款项，实际上成为解决军政府财政困难的主要办法。在发行公债时，廖仲恺鉴于军政府国内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就将发行公债的重点放到了海外，在海外引起极大的回应，尤其是南洋及美洲的华侨，纷纷认购公债票，有力地支持了护法斗争。

廖仲恺的革命生涯最为主要的特点是终生理财，是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财家。而与此同样值得彪炳史册的是他终身理财而不爱财，两袖清风一辈子，清正廉洁。就以这次大规模向海内外发行公债票券而言，这在常人眼里看来，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捞钱的好机会，但廖仲恺在发行公债票的全过程中，对于债票销售数目报告、债票的号码的呈报及存根表册的上缴等，都是清清楚楚，没有一笔糊涂帐。有人感慨地称赞廖仲恺多年“全权管理党的财务，直到民国 8

年在结算的时候，也没有一笔不清楚的帐目，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条而支出去的款项。”这说明的是什么？说明廖仲恺是一位才干卓著的理财家，更说明他两袖清风的清廉正直的品质，以及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孙中山有了这样一位忠实可靠的理财家，的确是幸莫大焉！中华民国幸莫大焉！

这次护法运动，廖仲恺尽了最大努力筹措各种款项来支持，但由于掌握西南实权的唐继尧、陆荣廷的暗中阻挠和拆台，并且刺杀了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海军总长程璧光，操纵非常国会审查军政府改组案，取消了大元帅一长制，迫使孙中山辞职离开了广东，运动宣告失败。

不久，廖仲恺与何香凝也离开了广州，前往日本。1918年6月底，又回到了上海，与孙中山一起探讨辛亥革命后革命几经起落终以失败告终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探索革命和中国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五、身陷囹圄斗叛逆

1919年至1920年这两年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到了中国，作为时代的先行者，俄国成功的经验深深吸引了孙中山和廖仲恺。在孙中山要积极宣扬新思想的指示

下，廖仲恺竭力辅佐孙中山创办新的理论宣传刊物，诸如《星期评论》、《建设》等，来加强党思想理论的建设；与此同时，廖仲恺更潜心研究探索三民主义并加以积极的宣传。而何香凝为了自己的丈夫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研究理论，担负起了操持家务和教育子女的工作。

廖仲恺在深刻反省过去理论指导上的得失的同时，积极协助孙中山扶植援闽粤军以壮大革命势力。

所谓援闽粤军，是当时孙中山手中掌握的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早在护法斗争中，孙中山深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凡事都力不从心，尤其是当时广东的桂、滇军阀根本不听从他的指挥。因此，孙中山与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庆澜、李耀汉等多次交涉，反复努力，才从朱省长直辖的警卫军中调出 20 个营，改编而成为援闽粤军，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廖仲恺对于这唯一的一支护法军队，也是孙中山寄予厚望的队伍，予以了特殊的支持，特别是财力方面的支持。在援闽粤军军饷给养不继的时候，总是多方设法筹款来接济他们。孙中山在上海的房子，就因为专门为援闽粤军筹款而抵押过至少两次，都是由廖仲恺经手办理的。

1919 年 10 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

组成中国国民党，指派廖仲恺为本党党务、总务和财政三个部中的财政部长。

1920年，在孙中山、廖仲恺的督促之下，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利用直、皖系军阀即将火并而矛盾重重的有利时机，从基地闽南漳州发起讨伐桂系军阀之战，至10月底，返回了广东。廖仲恺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派，出任了广东财政厅长。11月底，孙中山返回了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正式组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廖仲恺在新政府中被任命为财政次长代理部长之职，挑起了为中华民国政府筹措军政经费、整顿广东金融财政的重担。

面对被桂系军阀大肆搜刮后千疮百孔、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廖仲恺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之重。他锐意整顿各项税收制度，力争扩大省库的收入，以应付和保障中华民国新政府各项军政支出的费用；同时，廖仲恺积极整理扩充广东省银行，统一广东纸币，来维护纸币金融；还发行各种应急的公债和借一些外债，以应付一些特殊的紧急所需。

在廖仲恺的经营下，广东的财政金融有了很大的改观。广州《英文时报》的记者曾这样评价廖仲恺的工作：“广东财政厅长廖仲恺君，本精治计学，又以公正洁白之诚整

理粤局，故虽在创巨痛深之后，而广东财政前途仍大可乐观。”正是廖仲恺的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广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孙中山再次进行护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再次举起了护法的旗帜，6月27日，正式发布了讨伐桂系陆荣廷的命令，粤军西进讨贼。廖仲恺积极为粤军筹措军饷，同时出任“两广兵灾救济会”副会长，募集捐款，用于战争中的救难与抚恤伤员。而何香凝则积极投身到支前慰劳等工作，积极协助宋庆龄组织了“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并出任总干事，积极组织劝捐、演剧与卖物等活动，并去前线慰劳出征的军人。何香凝在日本学习期间专攻绘画，而这期间她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抽暇作了一些画送到“卖物部”，为前线筹款。

粤军将士在广东全体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广西首府南宁及其它城市，消灭了桂系军阀，将广西全境划入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统一了两广。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又积极部署发起北伐。廖仲恺积极支持北伐的决策，尽全力去筹措粮款，以求北伐尽早成行。但当时身居要职的陈炯明虽然一身四职，即中华民国军政部长、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却反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下达了北伐令，命各部军向湘、赣进发，但坐镇广州的陈炯明抗命不遵，按兵不动，且拒绝接济北伐军的粮饷，致使北伐军被迫班师回粤，准备改道由江西北伐。陈炯明得知北伐军主力即将回师的消息之后，以为其矛头是针对自己，准备集结部队对抗。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激化，关系濒于破裂的危急情况下，廖仲恺在双方之间往来斡旋，以图稳定大局。一方面请求孙中山慎重处理陈炯明的问题，以免激得他狗急跳墙，酿成意外的事变；另一方面，廖仲恺又积极敦促陈炯明面见孙中山商量一切。但心怀鬼胎的陈炯明不敢到梧州去见孙中山，反而向孙中山请求辞职，以探虚实；但孙中山径直批准了他的辞呈。虽然，廖仲恺在其中极力回旋，想使孙中山收回成命，以免激变陈炯明，但孙中山拒绝收回成命，只是要陈炯明到梧州来面商。陈炯明得知此讯后，愤然离开广州，潜回惠州老巢。

孙中山回到了广州之后，继续争取让陈炯明留任陆军部长，同时积极部署北伐各项事宜。5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布了北伐令。廖仲恺在新省长伍廷芳的支持下，旬日之间就筹集了北伐军费国币300万元，使各军都能及时地集结在韶关待命，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廖仲恺除了积极筹募粮

款外，还积极与陈炯明联系，期望他迷途知返。而陈炯明却狡滑地利用了廖仲恺这种挽救革命同志的努力，煞有介事地声称愿意留任陆军部长，而且还要派所属的熊略部准时赴韶关参加北伐。廖仲恺对此深信不疑。

5月8日，熊略部到达了广州，同时陈炯明的其他所属的部队也到达了广州，无形中形成了对广州的占据。在陈炯明的唆使下，其部属叶举部公然向孙中山提出恢复陈炯明一切职务，罢免胡汉民所兼各职等无理要求。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任命陈炯明为“督办两广军务职”，并由廖仲恺支付了陈部饷械现金90万。但陈炯明得寸进尺，又授意属部进占各机关。廖仲恺在此情势之下，密电孙中山：“叶举部屯集省城恐有异动，请大元帅回省城以收镇慑之效”。孙中山收到电报之后，考虑到安定前方的军心和稳定后方之需，不顾胡汉民等的反对，立刻返回了广州。

6月中旬，陈炯明密谋叛乱，在其所罗列的黑名单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廖仲恺。他们认为：抓住了廖仲恺就断了孙中山北伐的财源，锁住了“孙大炮的荷包”。15日下午，陈炯明的部属钟景棠以商量要事为由，诱捕了廖仲恺，押送到石龙钟景棠的司令部，后又转往惠州。陈炯明回到广州之后，又将廖仲恺羁困在石龙。

在拘捕廖仲恺的次日，叶举等部奉陈炯明之命在广州发动了叛乱。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卫士的护送下，从间道出走。孙中山旋即登上了永丰舰，指挥平叛。

在孙中山与廖仲恺同时蒙难遭劫之际，何香凝四出奔走，打听孙中山与宋庆龄的下落。在找到宋庆龄之后，又先后三次冒着危险往返于永丰舰，为孙中山送衣服、传递消息和信函。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有了着落之后，方设法营救廖仲恺。

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窘困，有道是“祸不单行”，廖仲恺蒙难，而何香凝染上了红白痢疾，每天打针吃药，为了能四处活动，她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在裤子里捆上尿布，忍受着身体、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折磨，设法营救廖仲恺。在廖仲恺被捕 10 天以后，何香凝终于见到了廖仲恺。此时的廖仲恺已经浑身污秽，不成样子，还被三道铁链锁在一张铁床上。在回广州的船上，何香凝想起丈夫的惨状以及孙中山亡命孤舰的凄凉，嗟叹革命前途之渺茫，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一死了之。但想起革命所走过的风风雨雨，想起见到廖仲恺时，他那“临难不苟免”，“沉毅坚决的表情”，何香凝又下定了决心，坚决地活下去，与敌人斗到底，设法把廖仲恺营救出来。

一段时间，何香凝终于挺不住了，住进了医院。但她时刻注意着有关廖仲恺的消息。就在此时，陈炯明的族弟陈达生在香港遭人暗杀，有人露出口风是报复陈炯明囚禁了廖仲恺。陈炯明迁怒于廖仲恺，准备杀害廖仲恺。何香凝在医院听到这个传闻，不顾身体的虚弱，立即又四处奔走营救廖仲恺。

廖仲恺在狱中，自觉已无生还的希望，写下了 10 余首诀命诗，追忆了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喊出了“死生如一我何哀”“生无足羨死奚悲”等气壮山河、以身殉国的豪言壮语。在何香凝来探视时，不顾卫士的阻拦，将自己写好的诗稿交给了何香凝，要她带出狱中。

何香凝见到这些诗稿，知道丈夫已决心以身殉国，心如刀绞，暗下决心一定要直接找上陈炯明，作最后的努力。

8月8日，孙中山因北伐军回师平叛失败，乘英炮舰“摩汉号”离开了广州。几天后，何香凝听说陈炯明在白云山召集会议，就冒雨赶上白云山，当面质问陈炯明为何囚禁廖仲恺？陈炯明理屈词穷，推说是部下干的，又假意写了一张条子，说要将廖仲恺转移到白云山来。

何香凝识破了陈炯明的诡计，将条子掷还给陈炯明，大义凛然地叱责道：“我今天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我就要你一个明确的

答复，是放人还是杀人。要放你就让廖仲恺和我一起回家，你所说的押上白云山是明放暗杀。做事要痛快磊落！”陈炯明考虑到公开杀廖仲恺于己不利，只好写了手令释放廖仲恺。当晚，廖仲恺总算结束囹圄生活，和妻女团聚。

刚刚回到家中的廖仲恺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要料理被陈炯明部烧毁的朱执信学校的事宜。何香凝想到陈炯明勉强放廖仲恺的情形，提醒丈夫说：“陈炯明放你只是一时迫于形势，是出于一时的良心的冲动，很可能要变卦！”廖仲恺听从了妻子的劝告，离开了广州。果不其然，在廖仲恺与何香凝离开的当天，陈炯明又派兵来抓廖仲恺，结果扑了一个空。

廖仲恺没有在香港逗留，而是转道去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又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

六、联俄联共中砥柱

陈炯明的叛变既是孙中山与廖仲恺本人的一场劫难，同时，更是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次打击又促使孙中山真正觉悟到国民党正在堕落，走向衰亡，需要寻找新的朋友和注入新的血液。联俄联共势在必行。

孙中山在永丰舰蒙难时，就要陈友仁转告俄共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革命唯一真正的朋友是苏俄。脱险以后，更是积极地将联俄付诸实际行动。而廖仲恺在囚禁当中就已经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发出了‘悟前非’的呼声，他在狱中所写的诗中指出：“扣马夷齐思止暴，亡羊臧谷共伤时；窃钩盗国将谁咎？扁铜絨滕只自欺。”用比喻的写法说明了已往的所作所为不足以拯救中国，中国革命必须弃旧图新，才能有出路。因此，他这次脱险出来，在夫人的支持下，促成了孙中山实行联俄的计划，成为孙中山执行联俄政策的有力的助手。

1922年9月下旬，廖仲恺与何香凝奉孙中山的指派，以参加家兄之女在东京举行的婚礼为借口，准备在日本与苏俄代表越飞谈判中俄合作的重大事宜。虽然这次接洽，由于苏俄赴日受阻而未能完成这项使命，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在联俄这项重大决策中对于廖仲恺的倚重。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正式发表，公开宣布与苏联结盟，标志着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随后，越飞为促进日苏复交和治病，前往日本。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以给女儿廖梦醒治病为由，与越飞同赴日本。自此开始了与越飞及其秘书长达1个月的接触，围绕着《孙文·越飞联

合宣言》展开了磋商。这次谈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促成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具体化并使中俄合作日益密切。其直接后果就是苏联致电孙中山，明确地表示“准备给中国必要的帮助”。

到了10月份，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将军赴广州，商量“中国革命未完成之救济方法”，直接来帮助中国。随后，苏联政府每年约200万元的经济援助及大批的政治、军事顾问源源而来。从而使得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此中的变化，廖仲恺的功绩是难以磨灭的。

陈炯明的叛变固然使得孙中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同时也使得他猛醒，从而毅然接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而全力支持孙中山实行改组，成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助手的正是廖仲恺。在众多的国民党元老中，孙中山之所以独选廖仲恺是有其考虑的。一是在当时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元老中，只有廖仲恺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且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而汪精卫或胡汉民之流或是反对，或是持折衷的态度，不明确表态。二是廖仲恺以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忘我的工作态度深得孙中山的信赖。正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孙中山在联俄联共等重大决策上都听取廖仲恺的意见，并得力于他的帮助。

从1923年10月开始，孙中山命廖仲恺担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委派廖仲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9位委员之一。但由于当时反对改组的人实在是太多，以致于9委员中除了谭平山还帮忙外，其它人都不肯负任何实际责任，这就使得当时改组国民党的重担差不多都由廖仲恺一人承担了。

廖仲恺没有辜负孙中山的厚望，废寝忘食地为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当时反对改组的人实在是太多，廖仲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些反对改组的资深国民党元老不敢反对孙中山，就将不满全都泼到了廖仲恺的身上，极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

在这些巨大的压力下，廖仲恺一度有些承受不住了。有一天，廖仲恺对何香凝说：“大家都反对改组，我实在是办不下去了。真是令人太气闷了！我打算离开广州，先到香港去休养几天。免得遭到这么多人的反对！”并订下了次日去香港的轮船票。何香凝极力劝慰也无济于事。由于担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何香凝虽然深知自己丈夫所受的委屈，但她仍不同意廖仲恺这样拂袖离去，但又苦于劝慰不了他，只得在第二天告诉了孙中山。

孙中山得知此讯，大吃一惊，立即派人

将已经上船的廖仲恺劝了回来，并且立即找他谈话，对他说：“仲恺，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怎能离去呢？我听说你还打算去德国，这更是万万不可以。你一定要留在这里帮我改组国民党，此事非你莫属！”何香凝也在旁解劝说：“孙先生这样委重于你，只有鞠躬尽瘁！你留下帮孙先生吧！”

正是这些鼓励和帮助，给了廖仲恺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使得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并从此一心不悔地坚持做了下去。面对党内的重重阻力，廖仲恺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多次坚决地对何香凝表示说：“改组对于我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必要的！民国成立已经 10 余年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的原因就在于党的组织上有问题。我可怜先生奋斗一生，未能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得把国民党改组不可！党内的那些反对的人并不是为了党的前途考虑的，只为意气反对，不必管他。我立定决心要改组，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冲突！”最后，他坚定地对何香凝说：“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使是击杀我，也在所不惜！天若假我三年以从事国民革命，当必有成效可观！”言语中充满的是革命的豪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经过廖仲恺的辛勤努力，到次年初，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为国民党“一

大”的顺利召开和国民党改组的最后完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极坚实的基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胜利召开，通过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这个《宣言》是一个革命的宣言，孙中山称之为“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但这个《宣言》，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缺乏明确的反帝政纲。为此，廖仲恺奉孙中山的指派，准备了一份临时提案，主要补充了反帝条款，油印了近2000份，联合一些代表连署，提交大会讨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这个带有强烈的反帝色彩的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并得以补入到《宣言》的对外政纲中。

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廖仲恺的另一个伟大的贡献是粉碎了右派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阴谋。

28日的这一天，国民党右派有预谋地由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应在党章草案中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的条款，并且声称“一个党员只能有一个党籍”，意在逼迫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脱离自己的党籍或离开国民党，从而达到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的险恶目的。其它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也随声附和，不同程度地支持方的提案。

廖仲恺在静静地听过他们的发言后，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反对这项提案，他义正辞

严地指出：“共产党加入本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并非是用来拖累我们，而是与我们同作国民革命工作的。而中国国民党只有与其它革命党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胜利。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这项引起争论的提案是有害的，应当予以否定！”廖仲恺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的共鸣，不断被热烈掌声和赞许声所打断。他的发言切中了阴谋者的要害，使得反对者无言以对，没有人能站起来加以反驳。从而一锤定音地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在国民党党章中保留了允许共产党跨党的条款，为国共合作最后铺平了道路。

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何香凝也充分发挥了作用。作为大会的代表，何香凝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并且在何香凝的努力下，这个提案获得了通过。

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国民党“一大”和改组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甚至于当初不赞成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汪精卫曾说过：“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孙先生的决心和定见所作成的；而不避劳怨，用十二分的努力来实行孙先生的决心和定见，廖先生是第一人！”蒋介石也承认：“当时如果没有廖先生，如果没有他那样的决心和热

情来辅助（孙）总理，恐怕 13 年本党的改组，难得有那样彻底的精神和伟大的成果。”

在以后的斗争中，廖仲恺与何香凝忠实地执行孙中山所倡导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于国民党中所掀起的弹劾共产党案、制裁共产党不法行为案以及警告李大钊攘窃国民党党统案等等，廖仲恺都予以了坚决的回击。并且积极支持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各项活动，诸如沙面大罢工、省港工人大罢工等；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支持赞助农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周恩来同志指出：“廖先生是我们国民党中央历史上仅存的有数的领袖之一，总理的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者最真实的信徒！”而此时间香凝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劳动妇女解放的运动中去了，积极倡导和组织了中国妇女首次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筹办和主持了国民党贫民产妇医院，开办妇女学校、合作社等，以及组织妇女群众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去，成为我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七、筹建黄埔搏军阀

熟悉军事史的人对于黄埔军校肯定不陌生，有人称之为将军的摇篮，更有人称之

为中国的“西点军校”。不仅许多的国民党将军出身于黄埔，更有许多的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也是黄埔军校的高才生。而这样一所重要的军校的创立，廖仲恺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是创办军校和党军最为努力的人。

深受依赖军阀之苦的廖仲恺曾对何香凝说：“改组之后，还需完成的有两件事，那就是建立军校和扶助农工。若此两事有成，则国民革命必能成功，国民的前途也大有希望！”为此，廖仲恺积极倡导和鼓动筹建一支革命主义指导的革命军队。

1923年11月，廖仲恺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指派廖仲恺为该校的政治部主任，负责筹办。廖仲恺在大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同时，投入极大的精力来筹办军校。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起挑选了首批教职人员，并多次督促滞留宁波的蒋介石速回广州参加军校的筹办工作。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孙中山亲自勘定广州黄埔长洲岛为校址，手令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而廖仲恺则奉孙中山的指令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请与会代表推荐生员。廖仲恺强调说：“生员必须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的”，为将来黄埔的发展铺下了极好的基垫。

在蒋介石负气辞职后，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托，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当时，筹备黄埔军校的工作并非是一帆风顺，既有信心不足的，冷眼旁观的，更有扯后腿的。而那些地方实力派，诸如广东的旧式军队的统帅、挂着革命招牌但别有所图的滇桂军阀杨希閔、刘震寰等更是不希望出现一支与自己抗衡的新式军队，因此设下了重重障碍。面临这些困难，廖仲恺毫不动摇，他坚定地对当时一起筹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一定要办成！党要办的事情，不能因为蒋先生不要就办不成。办不成，蒋先生就要开罪全党，将来他想回来参加革命就会困难重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军校的筹备工作照常进行下去！”廖仲恺说到做到，他在军校的筹备工作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制定了军校的各项章程，并且从解决干部、招生与经费三大方面着手，具体解决筹备时期各项具体工作面临的困难，迅速地打开了建军校的局面。

在筹备工作中，廖仲恺首先注重的是干部的聘请。一方面他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校工作，同时充分发挥国共两党合作的便利条件，从两党当中延聘优秀的军事人才。诸如像周恩来等当时滞留在国外的优秀人才，就是廖仲恺汇寄的路费，得以回国效力的。而军校筹备之初，资金十分困难，全赖廖仲恺

百般支撑，四处筹划。

当时广东的财政全被滇桂系军阀所把持，政府几乎没什么税收，更谈不上给筹办中的黄埔军校拨经费了。为了筹划经费，廖仲恺常常是夜里亲自到杨希闾吸大烟的烟床旁求得杨希闾签字，方能去领一点可怜的经费，再亲自送到军校去。

有一天，何香凝在家等着廖仲恺，一直等到了夜间4点钟，叫工人为廖仲恺烧了3次的洗澡水都凉了，一向无怨无悔地照顾丈夫的何香凝为多次麻烦工人而过意不去，不免对廖仲恺有所埋怨。廖仲恺心酸地对贤妻说：“我今天晚上又是在杨希闾家等他签字领经费。直到他吸足了大烟，我才得以领到这几千元钱，如果我领不到这笔钱，军校的学生就要断米绝粮了。”何香凝听罢，那里还有气，连忙亲自照料丈夫洗澡休息。据当时亲历黄埔军校艰难创业的人回忆，黄埔军校几百学生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各项杂费等都是廖仲恺这样忍辱负重、辛苦筹集来的。

在此期间，何香凝给了廖仲恺以巨大的支持。她不仅细心地照料丈夫的生活起居，使得廖仲恺能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命工作，还千方百计地为丈夫分忧解愁。廖仲恺筹集的经费有时不足整数，多是何香凝从香港亲友处设法凑足的。有一次，廖仲恺要为

黄埔军校买东西，短缺 400 元，到何香凝处取钱，不料何香凝处的钱都拿出还差 30 元，最后，只好由何凝向女工借了钱方凑足此数，解了燃眉之急。有时为了帮助廖仲恺应急，何香凝甚至于拿东西到广东去典当。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黄埔军校的师生对于何香凝都十分地尊敬，称他为“廖师母”。

在积极筹建黄埔军校的同时，廖仲恺不断给蒋介石拍去电报，催促他返回广州继续筹办军校，前后拍去的电文有 10 余封之多。在黄埔军校筹建基本就位的时候，蒋介石接受了戴季陶的劝说，回到广州，以掌握军事实力。孙中山见到了蒋介石，立即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而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6 月 16 日，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举行了开学典礼，宣告这个新型的革命军官学校正式成立了。

回想黄埔军校的艰难创业过程中廖仲恺的辛苦与操劳，称之为“黄埔军校的慈母”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可以说，正是廖仲恺的辛勤哺育，方有黄埔军校的今天。

军校成立以后，廖仲恺积极投身到军校内部的各项制度的确立和贯彻执行的工作当中去。他的总体方针就是政治建校、军事与政治并重。从后来的实际效果上看，廖仲恺的确通过他的努力，为黄埔军校树立了政

治教育的模范，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恽代英在《廖仲恺与黄埔军校》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廖仲恺的功绩，他指出：“组织革命军和动员农工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劳，要属之廖先生。廖先生不愧是革命军人的领袖！”国民党内对于廖仲恺在创建军校方面的功绩也是有口皆碑，认定廖仲恺为“真是黄埔的慈母”。甚至于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学子成业，党军成师，皆赖廖先生着殷勤训诲，辛苦经营。”

黄埔军校创立之后，平定广州商团的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以及镇压滇、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其中廖仲恺与何香凝所起的巨大作用更是难以一一细说，有时甚至是扭转乾坤的。

广州商团本是广州民族资产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成立的保守中立的武装自卫团体，但在陈廉伯出任团长之后，逐渐蜕变为反对国民革命的反动组织。自1924年5月起，公开采取敌视广州革命政府的行动。陈廉伯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组织商人政府。

正当广州的形势变得日益险恶时，廖仲恺出任了广东省长。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局势的险恶，立即着手千方百计地争取商团

与政府合作，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但无济于事。在陈廉伯之流谋叛之心暴露之后，廖仲恺采取了通缉陈廉伯等果断的措施来打击商团。在商团一意孤行地举行罢市之后，廖仲恺断然采取强制手段，诸如实行全市戒严、强制停止罢市等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正当廖仲恺力主严惩商团时，广州城内的滇军等军方却与商团沆瀣一气，达成了6项调停条件。廖仲恺认为商团绝无悔改之心，若不快刀斩乱麻地坚决制止，必将滋蔓扩大，酿成难以收拾的后果。但在胡汉民等的坚持下，孙中山被迫接受了调停条件，廖仲恺愤而辞去了广东省长之职。

不出廖仲恺所料，妥协调停之后，广州商团反而气焰更加嚣张，于10月10日正式发动了武装叛乱。廖仲恺虽然辞去了省长之职，但他一直关注着广州的局势。叛乱一发生，廖仲恺立即电告在韶关的孙中山，并亲赴韶关。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协同其他人一起，一举扑灭了广州商团的叛乱，保住了广东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廖仲恺与广州商团斗争及平叛的过程中，何香凝一直都站在廖仲恺一边，积极代表和支持女界支持政府的平叛，亲自带领妇女部的救伤队参加战斗，救死扶伤，并负责战地的裹伤施医。

经过陈炯明叛变的巨创以及国共合作

的洗礼，廖仲恺已经深深认识到了军阀的反动本质，他明确指出：“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都是人民的公敌！”因此，在平定了广州商团的叛乱之后，廖仲恺又把斗争的目光投向了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广东境内最大的军阀陈炯明，积极策划和组织第一次东征。

正当第一次东征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时，从北京传来了孙中山病重的消息。廖仲恺与何香凝心急如焚，经再三的考虑，廖仲恺对何香凝说：“孙先生的病重，恐怕是很难治愈了。现在党务、政事及东征之事都需我亲自料理，只有你去北京帮助孙夫人。”何香凝当即打点行装，匆匆北上。在北京，何香凝一方面帮助宋庆龄侍理孙中山的病，一方面同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善后回忆”进行了坚决斗争，反对段祺瑞的“不要过激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广州的廖仲恺则更加紧了东征的准备工作，团结各军，筹集军饷。当时苏联顾问曾对东征能否成功做出过推断，他们认为，东征出师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廖仲恺筹款的本领，但他们都信赖他能使这次东征最后成功。

正如苏联顾问所料，廖仲恺将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了东征的筹备中去了。虽然广东政府没有经费，但廖仲恺却从政治和物质两方面保证了东征计划的实现，为东征的胜利

奠定物质基础。

在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廖仲恺与何香凝又与隐藏在革命军内部的滇、桂系的杨希閔、刘震寰展开了斗争。在孙中山逝世之后，滇系军阀唐继尧与杨希閔、刘震寰勾结，企图夺权，颠覆广东革命政权，在此危急之际，廖仲恺力主武装平叛，但当时的政府首脑胡汉民根本无意讨伐。廖仲恺面对这样一个只考虑个人利益的懦夫和傻瓜，只好采取了制定出一套武装平叛的计划，来强迫胡汉民执行。在苏联顾问加伦和蒋介石的协助下，廖仲恺担负起了粉碎滇、桂军阀的颠覆阴谋的决策重担，为最终取得讨平杨、刘叛乱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廖仲恺在军事上的贡献一是重大决策的制定及调整，二是保证军事行动经费的按时到位和使用。换言之，廖仲恺对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殚精竭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廖仲恺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财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八、承继遗志真女杰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内“承继总理遗志，为党最能负责，最能工作，又勇敢于革命运动、工农运动及反帝国

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廖仲恺与何香凝利用一切机会号召全党同志继承总理未竟之志，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为革命的唯一指南。何香凝在总理弥留之际，虔诚地对总理保证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

廖仲恺、何香凝与当时那些表面上高唱继承总理遗志的人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说了，而且切实地做到了。他们首先竭力促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继承总理遗教、实行总理遗志和永远纪念孙中山的有关决定。同时，由于孙中山的去世，使得原先反对国共合作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再度兴风作浪。廖仲恺与何香凝又与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捍卫三大政策。

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资历最深的当属胡汉民，也是政府内的第一号人物，他本人有夺取最高统率权的企图。胡汉民虽然是以中立的身份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但他实际上是右派的首领，隐然为反共的领袖。而且为了夺权，不惜一味地与当时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权的滇、桂军阀妥协，只是由于杨、刘集团的迅速覆灭而流产。

胡汉民的这一系列活动使得廖仲恺认

识到要继续贯彻三大政策，必须将胡汉民排斥出现有的领导体制，实行权力的转移。为了继承总理的遗志，廖仲恺挺身而出，联合革命左派势力，与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改组国民党政府。

在国民党的改组中，廖仲恺与汪精卫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支持下，于 1925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主席，而将胡汉民改任并无实际职能的外交部长，免去他的代帅和广东省长之职。在改组政府中作用重大的廖仲恺却不贪名、不贪利、不贪权，只出任财政部长。他的这种磊落举动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和地位。明眼人指出：“当时广州政权实际上是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廖仲恺领导的，……形式上是由汪精卫领导政府。”廖仲恺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左派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廖仲恺的这些作为，引起了极端右派的切骨仇恨，他们一心要致廖仲恺于死地而后快。1925 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一起去惠州会馆参加例会。下车时，何香凝被妇女部的一位女同志叫住谈事，而廖仲恺与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一起向会场走去，在会馆台阶遭到了 5 个凶手的枪击。何香凝急忙将廖仲恺送往医院，但由于伤势过重，廖仲恺在路上就停止了呼吸。就

这样，廖仲恺遭了敌人的毒手，成为“努力奉行孙先生遗教而流血的第一人！”死时年仅48岁。

廖仲恺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颁令准予国葬，并令全体官员及官兵臂戴黑纱一周以示哀悼。8月25日出殡时，各界前来送葬的有10余万人之众。1935年6月，何香凝与子女一起至广州，取出廖仲恺的遗骨，护送灵柩至南京，至9月1日，举行了国葬，将廖仲恺安葬在南京中山陵西侧的紫金山南麓。

廖仲恺被刺之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展开了缉凶和审案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件本来十分简单的案子竟成为一桩悬案，结果是不了了之。廖仲恺九泉有知，真是含恨不已！

廖仲恺的被刺，对于何香凝的打击之大是无以复加的。但她毕竟是坚强的革命女性，死神的威胁并没有吓住她。在送廖仲恺的挽联上，何香凝是这样写的：

致命本预期，只国难党纷，费理正需人，一瞑能无遗痛憾？

先灵应勉慰，使完功继事，同魂齐奋力，举家何惜供牺牲！

“举家何惜供牺牲”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这也是何香凝对于那些企图通过暗杀来吓住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右派的最为直接的

回答！

何香凝在未来的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正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所谓“哀思唯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

何香凝一如既往地坚决贯彻和执行孙中山所倡导的三大政策，并对于国民党新老右派破坏“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的种种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国民党二大之后，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蒋介石积极反共，制造了诬蔑共产党暴动的“中山舰事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处。何香凝闻讯，不顾全城戒严，冒着危险直接找到蒋介石，当面斥骂蒋介石“背信弃义，以德报怨，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哑口无言的蒋介石只得撤走了包围顾问处的军队，并释放了被抓的共产党员。

同年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旨在对付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何香凝立即识破了右派的真实意旨所在，当场拍桌顿足地含泪痛斥这是反对三大政策，有违孙先生的真意。在以后的一系列斗争中，何香凝都与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何香凝通电全国，讨伐蒋介石背叛

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事业的罪行，号召全党“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的“七·一五事变”，在武汉大肆搜捕革命左派和共产党之时，何香凝正气凛然地出面保护。她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说：“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他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在庐山时天天斥骂反动派，还给在汉口的革命党人送去船票，以使他们脱离虎口。

为了表示不与断送国民革命的罪人为伍，她拒绝参加蒋介石与宋美龄 12 月初在上海举行的婚礼，更不担任他们的证婚人。而是回到了广州专心创办仲恺农工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她辞去了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以示与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分道扬镳。1929 年 6 月，她专程谒拜了南京中山陵。在中山陵前，何香凝思绪万千，写了《总理奉安后一日有感》：

紫金山上中山月，
照彻金陵烈士血。
烈士之血为谁流？
如斯代价空磨灭。

.....

我向阴魂慰一词，
君等冤仇必能雪。

填山移海大有人，
誓抱头颅为国掷。
众志成城莫可摧，
恶之逆之终自绝。
回头忽见月重明，
波涛声沓鬼声歇。

既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断送革命，
又对革命的最终胜利抱定了信心。

随后，何香凝出国游历了南洋及欧洲，
最后侨居于法国巴黎，过着清贫的流亡生活，
以示不与蒋、汪之流同流合污。

“九·一八事变”之后，何香凝立即回国，
投身到抗日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之中。
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谴责蒋介石的
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
和支持民众救国运动的主张。次年1月，
日军悍然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何香凝积极投入到抗日支前的活动中，
致电海外华侨，呼吁援助，多方奔走为
十九路军筹集军饷，并创办了一所“国民党
伤兵医院”。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
六大纲领》何香凝和宋庆龄都在上面签字
支持。次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抗日救
国统一战线的号召，何香凝与宋庆龄在
上海联络国民党左派首先响应支持，并
为其实现不断努力。

1937年春，何香凝积级支持沈钧儒、邹

韬奋等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出任救国会理事。6月，和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16人一起发起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七·七事变”爆发后，何香凝积极组织各界妇女支援抗日，慰劳抗日战士。皖南事变后，何香凝与其他爱国志士在香港联合发表了《宣言》，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有力地支持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何香凝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1月，何香凝与其他反蒋的国民党组织和党员一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次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已经年逾70的何香凝仍然投身到革命和建设之中，在20多年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真可称“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何香凝尽心尽力地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操劳和出谋划策，成为一位德高望重、深受海内外人士敬爱的革命老人和国家领导人。虽然何香凝所主持的事务是多方面的，但她主要的

精力大多投到了国家侨务工作方面，团结侨胞、侨属，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众所周知，何香凝还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和女诗人，工作之余，她欣然挥毫，不断地作画赋诗。陈毅在她所做的画中曾题到：“画树重高洁，画花喜独步，大师撮其神，一纸皆留住。绘画如其人，方向毫不误，画高寿亦高，但祝两繁富！”这是对何香凝的绘画风格和人品的高度评价。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在北京因病去世。宋庆龄在追悼词中称赞何香凝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战友，是廖仲恺先生的革命伴侣，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何香凝女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何香凝的遗愿，她的灵柩被护送到南京，与廖仲恺先生葬在一起。

廖仲恺何香凝这对革命的伴侣，在苍松翠柏之中，安然长眠！

